

您现在的位置: 1A3.cn中国新闻观察中心 >> 中国新闻观察中心 >> 新闻史学 >> 正文

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

作者: 侯丽军 文章来源: 中国新闻观察中心

[摘要] 1985年至1991年间, 苏联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政策与苏联的解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公开性”改革及其中的传媒变革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公开性”政策中的失误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公开性”改革的积极意义, 更使媒体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关键词] 苏联; 公开性; 大众媒介

一、“公开性”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公开性”(Glasnost)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创造。据有关学者考证, 该词源于斯拉夫古教堂用语“Glas”, 指声音, 演讲或宣传, 并不像“对公众负责”这个概念那样, 含有完全的坦率或诚实之意。“公开性”具有独特的法律含义, 指与秘密审判相反的公开法庭听证会。自从彼得大帝在18世纪对俄国的官僚体制实行合理化改革之后, “公开性”这个词就与苏俄的统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19世纪, 所谓的“开明的官僚”用“公开性”这个词作为武器, 反对像果戈里在戏剧《钦差大臣》里所描绘的那种官僚专制、封闭和腐败。尽管“公开性”曾对1861年废除农奴制起过作用, 但它并不旨在向独裁者的权威挑战, 而是要维护沙皇的地位, 通过建立一个中庸的言论机构, 部分地缓解由压制思想而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紧张。(李秀萍, 1988: 35)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已提出: “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经过选举是“广泛民主原则”包含的“两个必要条件”。(《列宁全集》, 1986, vol.6: 131)他认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 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 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的”。(《列宁全集》, 1959, vol.5: 448)至于经济活动的公开性, 列宁指出: “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 也就是说, 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 1983: 497)这种公开报道, 将会“使国家所有的公社知道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 其次可以评比这个和那个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果;最后可以保证各个公社运用其它公社取得的经验, 可以保证互相交换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部门中显得最好的人力和物力”。(《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 1983: 501)此后, 列宁又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但是, 由于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着艰难的国内外环境, 以及列宁的早逝, 公开性原则未能得到广泛实行, 也未有什么新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高度保密制影响到许多方面。这种制度是党政机关得以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它使得普通党员群众“对上级领导工作情况难以了解, 因而也难以监督”。(刘克明, 2003: 6)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 “公开性”作为政治术语才又被重新提出。(刘克明, 金挥, 1990: 651)1977年, 苏联宪法中正式把“扩大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固定了下来。但是, 这一原则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80年代初,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主政时, 虽也曾多次谈及这一问题, 但均缺乏切实的保证措施。(刘克明, 金挥, 1990: 676)

对公开性最为重视、说得也最多的还是戈尔巴乔夫。(齐向等, 1992: 274)早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1984年, 他就曾论述过公开性问题, 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 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 广泛、及时和公开通报消息, 是信任人民、尊重他们的理智和感情, 以及他们自己能够搞清楚某些事件的能力的证明, 种做法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 和国家机关的公开性是同官僚主义弊端进行斗争的有效工具”。(《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87: 1)1986年9月, 戈尔巴乔夫在视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时, 又谈到“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公开讨论我国社会生活最紧要的问题、国家的发展。这将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新的, 完全新的气氛。”并呼吁“我们应当扩大公开性, 应当将更多的事公诸于众, 我们的人应当知道劳动集体、区、州、共和国、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谈改革与民主化》, 1987: 8)

1987年11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 戈尔巴乔夫指出, “公开性和民主应当充分地、可靠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公开性和民主的问题, 这是人民参加管理地问题, 不能只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上电视和报纸。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 没有人民, 不同人民商量, 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一项重大任务。这就是说, 必须发扬公开性, 开展民主化进程, 以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苏共中央会议上谈党在改革中的作用和任务》, 1987: 32)

1987年11月, 戈尔巴乔夫在其出版且轰动国际社会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郑重发出呼吁: “让公开性大放光明!”(戈尔巴乔夫, 1987: 88)一时间, “公开性”和“改革”两个词, 成了戈尔巴乔夫政策与作风的标志性词。

英国学者布赖恩·迈克奈尔曾这样形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 公开化运动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潜在的激进民主主义, 并将其呈现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面前;作为一种尝试, 它试图恢复斯大林主义之前的一些政策, 那时, 布尔什维克们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自从1920年以来, 这是第一次试图建立一种存在争论和差异的, 而不是统一和严格管制的政治文化。(埃尔德里奇, 2004: 71)

二、“公开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文章标签 关键字

站内搜索

最新文章

- 苏宁秒杀欺骗消费者 被网友质疑骗取资金
- 社科院2011年经济蓝皮书: 85%家庭无能力购房
- 短命建筑来自“短视”文化
-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现状: 未上马已脱缰 无一合…
- 明年春运实名制火车票还能改签吗?
- 我国现新冠号码人民币 央行回应“假币”质…
- 社科院: 今年房价上涨15% 明年或现报复性反弹
- 胡锦涛主持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舟曲抢险救援
- 奶粉“激素门”需要先过检测门

热点文章

- 提升网络传播的眼球价值
- 提高公信力: 破解博客“七年之痒”
- 人们为何爱Google?
- 从《阿凡达》到《孔子》
- 网络内容整合: 内涵与类型
- “糖醋活鱼”被西方媒体利用, 孰之错?
- 由“报办集团”向“集团办报”转变
- 记者应反映现实而非虚拟现实
- 新《侵权责任法》有关网络侵权的条款保护了…

重点推荐

- 纸质书终消亡 Kindle传承阅读
- 网络“伪事件”的注意力经济
- 舆论动力学初探
- 路透社2009年突发新闻类年度图片
- 海外华文媒体研究的新思路
- 论大众传媒对现代舆论的影响
- 《传媒博弈论》重磅推出
- 虚拟世界喧嚣背后的现实思考
- 提高网络媒体公信力问题探析

根据六年中戈尔巴乔夫指导思想的演变和苏联改革的曲折历程，“公开性”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起始阶段(1985-1986年)、扩大阶段(1987-1988年)和舆论失控阶段(1989-1991年)。

戈尔巴乔夫设想的“公开性”改革在1985年开始有所行动。前任《真理报》总编辑维·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中提到，1985年4月以前，公开性实际上还不曾有过，公开性是逐渐成熟起来的，尽管某些报章无论是在1985年4月以前还是以后都曾做过超出允许限度的事情。(阿法纳西耶夫，1993：160)

“公开性”展开的第一个行动是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的列宁格勒视察之行。此行成为苏联国内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共领导人还是第一次走上街头与群众见面；视察中，戈尔巴乔夫让政府车队停下来，接着下车走向群众，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试图解释国内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随后不久，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美国《时代》杂志和与三个法国电视记者的采访，这是“公开性”改革的突破口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思维和口才改变了领导人在观众中的刻板形象，这在苏联国内和世界上都引起广泛的关注。戈尔巴乔夫同媒体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

1986年2月13日的《真理报》发表女记者达吉亚娜·萨摩里斯的文章，题为《净化，开诚布公的谈话》。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公开性”改革正式启动的标志。文章用尖锐泼辣的口吻批评了党内官僚主义、滥用职权、裙带风、挥霍公款等腐败现象，并建议“净化”共产党，把腐败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至此，“公开性”改革成为苏联媒体批评制度的新出口，这鼓励了在报刊、广播、电视上对制度缺陷发表批评意见的行为。

同时，“公开性”也拉开了苏联政治改革的序幕。它带来了信息开放和共享，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权知道和应该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没有经过修饰和限制的事实真相。于是，大众传媒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帮助民众了解真相的任务。于是，在80年代后期的苏联，大众传媒和“公开性”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

具体说来，“公开性”改革中对大众传媒的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重要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时效性。戈尔巴乔夫每周定期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公布政治局例会以及中央和政府重要会议讨论的问题和决定，内容比过去详细；

其次，苏联领导人和舆论工具改变了过去“封锁消息”的报喜不报忧的一贯做法，开始通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事故。1986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苏共二十七大、苏美首脑会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都做了现场转播；

第三，增加对社会阴暗面的公开揭露，并将触角逐渐伸向以往的“禁区”：如军费的实际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科研、国防资金与物资的有效利用；

第四，允许在媒体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当前的改革措施进行争论；

第五，放宽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和严格审查西方报刊的政策，停止对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的干扰，允许外国报刊在苏联报亭上出售，这样苏联公众便有机会接触外国大众传播媒介，从而扩大了消息来源；

第六，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新闻机构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从1986年4月起，苏联的新闻机构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都由编辑部决定。批评领导人的稿件由社长或总编辑签发，无需经过上级或有关党委；

第七，放宽对新闻出版界的审查，除了有关国家和军事的机密外，其他一切内容均由报刊和出版物的总编辑负责。1987年至1988年间，戈尔巴乔夫先后取缔了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大部分功能；

第八，1990年6月12日，苏联议会通过《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体法》，主要是取消了新闻检查，允许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办报。新闻出版法扩大了媒体创办者、编辑部和出版社的自主权。这意味着苏联新闻媒体的体制和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公开性”与传媒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公开性”改革之前，苏联社会还处在一种封闭、僵化、精神压抑、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的状态之中。尽管苏联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采取一些变革的尝试，但是没有一次是有结果的。因为，所有这些尝试都没有触及制度的实质——所有制关系、政权结构、党对政治与精神生活的垄断。

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苏联媒体的主要角色仍然是社会控制机关，而不是政府和民意之间沟通的桥梁。在不尽真实、片面报道和对社会进行严格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而人民则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漠不关心。

1985年，戈尔巴乔夫作为契尔年科的继任者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亟需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但面对来自铜墙铁壁般陈旧政体和一批思想保守的党内实权派的阻力，要想让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并将民众的热情调动起来，就必须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因此，他倡导大众传媒开创公开报道事实、揭露问题、突破各种禁区、大胆批评不正之风、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的风气。

回顾整个改革的历程，“公开性”改革中的大众传媒为苏联社会进步发挥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作为“公开性”的一个重要成果，苏共中央开始通过传媒公开重大党务政务活动。如召开全国党代会、中央政治局会议、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地视察工作、跟群众谈话、与外国政要会晤、答记者问等等，新闻媒体都要作公开报道。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有这样的描述：“1988年7月13日，电视台、广播电台及中央各报刊的记者们破天荒地应邀来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会场上。此举可以看作是我国政府活动的一个新时代——公开性、坦率性、面向人民、同人民对话的时代的开端。”(雷日科夫，2006：232)

其次，“公开性”推动了重大问题决策过程公开。政治决策是政治体制通过一定渠道和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容纳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意愿和意志，最后达成最大成效的过程。政治决策不应是封闭式的、脱离大众的、不能触摸的，而应是开放的、参与式的、与大众合为一体的。而在过去，发生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一切，对苏联普通老百姓来说，始终是个谜。政府下达的命令和指示全出自圈子很窄的实权人物之手，没有任何的社会照看。但是在“公开性”的推动下，苏共逐渐改变了这种做法，开始规定在讨论和决定最为迫切的、重大的、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时，首先通过新闻媒体使广大人民看到政府会议的实况，使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并为他们所理解，就把政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从而加强了与人民的联系。(雷日科夫，2006：235)

第三，新闻媒体开始及时通报重大灾难事故情况。以往，苏联党政机关对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灾难或恶性事故，通常都采取遮掩、搪塞或避而不谈的做法，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在报刊上发布一则简短或含糊其词的官方消息。苏共27大以后，苏联部长会议改变过去报喜不报忧的做法，通过新闻媒体对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客轮沉没事故进行了及时报道，政府并就此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记者介绍人员伤亡情况。

第四，新闻媒体开始曝光一些社会问题与弊端。比如，黑市交易、贩毒吸毒、妇女卖淫、干部搞特殊化、压制批评、贪污受贿问题等等，都进入可以报道的范围。

第五，新闻媒体公开讨论社会热点问题。为激发广大听众、观众的改革热情及参与意识，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常常就经济问题、社会政治热点问题组织群众进行公开讨论。《苏维埃文化报》等报刊还开辟“直言”专栏，让人民群众各抒己见。有时，报刊还安排领导人与普通公民在媒体上对话，吸引了许多读者。正因为媒体贴近生活、贴近大众，所以呈现出活跃的局面，1986年秋季报刊征订时，许多报刊销量大增，比如，《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10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增加300余万份。(戈尔巴乔夫，2002a：153)。

第六，政府和媒体的沟通变得更加顺畅自如。“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的要求，事件的尖锐性都要求政府的工作跟上变化的形势，既要抓好各项管理决策工作，又要做好信息沟通工作。”(雷日科夫，2006：236)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说：“几家主要报纸的记者们经常被邀请采访讨论非常重要的、人们最为关注的议题的部长会议及其主席团的会议。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要在政府里准备大量能够反映讨论过程的分析内容、批判性观点和尖锐的分歧的材料，紧急发往塔斯社，用于刊登在当日晚报或次日晨报上。”(雷日科夫，2006：238-239)

此外，“公开性”改革还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莫斯科的许多外国大使和新闻专员都得到允许，访问苏联的情报局，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也可以在该局得到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信息。另外，政府还新辟了部长会议领导人和专家会见新闻界的场所，制定了建立自己的出版基地、电视和广播直播室等方面的计划。(雷日科夫，2006：242)

综上所述，正如雷日科夫所说，公开性作为民主的一个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特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实行它是不可避免的。(雷日科夫，2006：246)然而，苏联领导层在推行“公开性”政策中的失误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积极意义，更使媒体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四、“公开性”改革的历史失误与教训

德国的《独立报》曾评价说：戈尔巴乔夫选择的用来革新社会主义的手段——“改革”、“公开性”和“新思维”不是导致革新社会主义，而是埋葬了社会主义；他想消灭掉“极权主义”，但却毁掉了共产主义；他想给人民以自由，但却毁掉了这个国家；他想给社会以民主，但却毁掉了这个社会；他想给人民以秩序，但却带来一片混乱。(石妍，金欣，1999：143)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如此美好，但许多结果却与他的设想截然相反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者认识上的误区和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常常使政策的内核发生变质。另一方面，执政者将改革的节奏放开后，改革常常会超出其“理性预期”，产生溢出效应。

首先，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历史问题的认识误区，实际上间接支持了“公开性”中的大众传媒篡改和涂抹苏联历史的倾向。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在苏联历史的研究和评论中存在许多“禁区”，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要敢于突破禁区，他号召不要掩饰历史上的错误和困难。(曹长盛，张捷，樊建新，2004：319)

戈尔巴乔夫的言论鼓励了大众传媒展开对苏联历史不加区分的否定和批判。首先，知识界掀起了一场以揭露历史黑暗面为特点的历史反思运动。媒体从执行公开性方针突破思想禁区开始，由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向前追溯，经列宁而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一些苏联知识分子看来，苏联历史的悲剧不能简单归于斯大林，而应从马克思开始算起，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经由列宁变成一种以一整个民族为对象并给它带来空前灾难的社会试验。(曹长盛，张捷，樊建新，2004：60-61)

有些学者要求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评价所有时期和党史上所有的人物，并就党史研究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在大众传媒上展开论战。然而，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却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当时苏联国内情况的矛盾性。这样不加区别地否定历史，其后果必然是使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苏共作为执政党被要求对一些阴暗面负责，这不能不损害苏共的形象，使苏共客观上被置于“被告”的位置上。

其次，在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激进改革之后，党逐渐丧失了对国家形势的控制，而作为特殊社会集团的媒体也开始发生分裂，成为各个新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经济改革后，苏联原先“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阶级结构逐渐被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所取代。新出现的国家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阶层，在政治取向上已不再拥护社会主义。党政精英们则逐渐蜕化变质，变成只关心权力和物质利益特权的阶层，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革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都将使他们面临失去权力和财富的危险。而摧毁原有的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则会使他们成为私有者阶级，从而根本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取向。同时，掌握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党政大权的地方领导人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他们在摆脱苏共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开始维护并不断扩大自己

通过“民主选举”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和社会地位，形成“地方精英”。

在国内冲突深化的过程中，作为特殊社会集团的媒体人员也开始分化。“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事业业已展开：粗暴的指责、攻讦、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抖露隐私。相互对立的看法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的私利。”(戈尔巴乔夫，2002a：156)

最后，随着媒体所有权的放开，党对社会舆论的导向功能完全丧失，激进媒体借助公开性在很大程度上动摇甚至摧垮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已经越来越落后于迅速变化的社会实际，越来越脱离人类生活的新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实践与客观需要。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指出，苏联国家体制的垮台是同它的合法性遭到破坏联系在一起的，其发生的快速程度令人难以置信。1917年2月俄国独裁国家机器的垮台也是这样。这说明意识形态专制的国家，在面对精神领域的攻击时是多么脆弱和孤立无援——如果找准了突破口的话。(卡拉-穆尔扎，2004：409)

在戈氏改革的后期，同以往苏联时期相比，大众媒体的报道形式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媒体几乎在瞬间转向马塞克文化类型的信息流——无论是就其语意的使用还是词藻的使用都是如此。在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没有人把完整的、人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概念和理论提出来加以讨论了。当时，出现另一种报道形式，它使思维混乱和支离破碎。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社会意识中建立“由秩序到混乱”的过渡。在这个阶段，没有什么任务要把人们重新组织起来，树立新的信仰，更重要的任务是怀疑所有的价值观，诽谤所有的神圣象征，以此来打破防范操纵的心理保护。(卡拉-穆尔扎，2004：833)

改革后期失控的大众传媒在报道中的严重失衡，也大大削弱了民众对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为了吸引眼球，媒体大量揭露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如酗酒、吸毒、卖淫等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这一切大大出乎人民的意料，沉重打击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感到茫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戈氏改革的结束期同两代人更迭的时刻重合了，这是一次重大的更迭——登上舞台的是一代积极行动的人，他们不了解，也没有感受过战争，他们不熟悉战后恢复时期的艰难困苦。”“许多人连最简单的东西都不知道，若想进行解释就需要使用某种新的语言。在这种条件下，由于上层出现了急转弯，苏共的意识形态机器瞬间就失灵了，连续性发生了断裂，好多编辑部的人员都遭到了清洗。保守派没有进行抵抗的准备，连有限的几次进行社会对话的机会也没有抓住。”(卡拉-穆尔扎，2004：833-834)

在苏联改革后期，种种操纵意识的手段把社会土壤中产生的分裂人为地加深了，这成了加剧危机的重要因素。站在反共立场上的激进的媒体人员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掌握的手段，强化和运用错误的思维范式(斯大林镇压的题目可以成为众多事例之一)，将其灌输到大众的意识中，继续加深思想的分裂。

与此同时，在抢占新的舆论阵地的浪潮中，外国广播电台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86年，苏共中央宣传部下令取消对外国电台的干扰，从此，民众可以随时听到“自由之声”、“BBC”和“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的广播。80年代末，随着传媒政策的进一步开放，英国广播公司甚至买下“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的周末半小时播出时段，开始每周一次的国际新闻和综述直播。(李玮，2005：10)这些外国电台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对当时因经济改革毫无起色而失望的苏联人民来说极具诱惑力和侵蚀力。

应该看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联的解体，与传媒控制权的丧失是有必然联系的。随着国家对传媒统一控制的丧失，法治和市场调节机制还未建立，传媒各为其主，各行其道，成了不同政治利益和社会组织的代言人，丧失了公正合理的立场。戈尔巴乔夫以为，只要给予传媒无限的自由，就可以制约和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矛盾。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法制无序的社会条件下，丧失对传媒的控制，就等于丧失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苏联国家的最终解体也就在所难免。

五、“公开性”改革对中国的启发与借鉴

苏联传媒与中国传媒曾经如出一辙，建国后的中国传媒制度是向苏联借鉴而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国传媒的发展道路非常相似。只是随着20世纪末两国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的分野，两国传媒才走上各自的转型之路。因此，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及其变革历程，对今天仍然处在变革中的中国传媒和中国社会，无疑具有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通过对苏联“公开性”运动中传媒变革的意义与失误的分析，本文认为，“公开性”改革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当今全球化和通讯网络异常发达的时代，诸如信息保密、言论封堵等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正常社会的民主发展，也要求透明度、公开性以及公民获得必要信息的自由。这就需要逐步实现政务信息公开，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发挥传媒有效的舆论监督功能，保障社会和公众的公共利益，推进依法行政。2007年4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第492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此举证明，我国在信息透明化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

其次，“公开性”改革的失误说明，激进式的改革往往会超出设计者的理性预期，造成截然相反的后果。正如戈尔巴乔夫在后来的反思中所说：“在我看来，当产生变革的需要时，进化式的改革是符合公民利益的社会发展的最佳形式。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改革的速度要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是社会公民的成熟程度、执政者的责任心、公众的相互宽容和不走极端。”(戈尔巴乔夫，2002b：15)

中国的传媒变革带有明显的渐进性色彩。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传媒事业开始试探性的、渐进的市场化改革。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转轨(1979年到1992年)，第二阶段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化发展阶段(从1992年至今)。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传媒都处于双轨制。(李玮，2005：163)今天看来，这种双轨制避免“传媒列车”突然转向所造成的倾覆，为传媒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及大众心理从保守到开放的过渡提供了缓冲空间。

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绝对不能放弃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正如雷日科夫所说:“公开性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直接取决于谁掌握实行公开性的工具,首先是电视、广播、报刊。掌握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公开性就变成一把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机体上僵死的或发生病变的组织,给新的健康的部分以发展的空间;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它会变成一根大棒,对周围的一切,不论好坏,不分先进落后,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雷日科夫,2006:246)

这一痛定思痛的认识,同我国新闻学鼻祖徐宝璜先生说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以及后来江泽民讲的“祸福论”,即“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何其相似。

我国传媒的变革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是为了避免苏联传媒改革的失误。具体说来,我国传媒变革的方针一是坚持国家所有制,二是坚持“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双轨制。强调国家所有制和事业性质,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对传媒的领导权,强化传媒的政治属性,使传媒在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舆论引导的社会功能。强调企业化管理,则是为了充分发挥传媒的经济职能,创造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巨大财富。这一切说明,我国传媒变革走的是一条冷静探索、稳中求动、循序渐进的变革之路,从而避免剧烈的转轨震荡和舆论失控。

可以说,我国已经进行的传媒改革,就是充分借鉴了苏联“公开性”改革中传媒变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逐渐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传媒体制。当然,我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还在探索之中,尽管国有资本在这个领域仍然占据决定性地位,但合资形式已经被认同,国外资本也开始被接受,中国正在形成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多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市场化传媒模式。(李玮,2005:165-166)

在新的探索时期,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困难。如何在新的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对传媒的有效控制和引导,使传媒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上稳步健康发展,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利器”,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这也是苏联的经验至今仍然、并将持续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阿法纳西耶夫,维·戈(1993).《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第1版).北京:东方出版社.[Afanas'ev, Victor G.(1993). The Memoir of Editor-in-chief of Pravda(1st edition).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埃尔德里奇,约翰主编(2004).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Eldridge, John(2004). Getting the Message: News, Truth and Power(1st edition).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3]曹长盛,张捷,樊建新(2004).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Cao Chang-Sheng, Zhang Jie and Fan Jian-Xin, et al.(2004). The Studies on the Ideology in the Evolution of Soviet(1st edit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4]戈尔巴乔夫,米·谢(1987).改革与新思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Gorbachev, Mikhail S.(1987).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1st edition).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5]戈尔巴乔夫,米·谢(1987).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谈改革与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新闻改革的言论.新闻业务,23,8.[Gorbachev, Mikhail S.(1987). Talking about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Krasnodar. Gorbachev' s speeches on media reform. Practical Journalism, 23, 8.]

[6]戈尔巴乔夫,米·谢(1987).在苏共中央会议上谈党在改革中的作用和任务.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新闻改革的言论.新闻业务,23,32.[Gorbachev, Mikhail S.(1987). Talking about the Role and Task of the Party in the Reform on the Conference of Soviet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Gorbachev' s speeches on media reform. Practical Journalism, 23, 32.]

[7]戈尔巴乔夫,米·谢(1987).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新闻改革的言论.新闻业务,23,1.[Gorbachev, Mikhail S.(1987). The Report on the Ideological Working Conference. Gorbachev' s speeches on media reform. Practical Journalism, 23, 1.]

[8]戈尔巴乔夫,米·谢(2002).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Gorbachev, Mikhail S.(2002). Reflection o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1st edition).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9]戈尔巴乔夫,米·谢(2002).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Gorbachev, Mikhail S.(2002). Truth and Confession—Memoirs by Gorbachev(1st edi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0]卡拉-穆尔扎,谢(2004).论意识操纵(第1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Кара Мурза, С.(2004). The Manipulation of Consciousness(1st edi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1]雷日科夫,尼(2006).大动荡的十年(第2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Rizhkov, Nikolai Ivannovich(2006). The Decade of Great Turbulence(2nd edition). Beijing: Central compiler Press.]

[12]李玮(2005).《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第1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Li Wei(2005). Russian Mass Media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1st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3]李秀萍(1988).“公开性”的含义.新闻三昧,(2),35.[Li Xiu-Ping(1988). The Meaning of Glasnost. Xin Wen San Wei Magazine,(2), 35.]

[14]列宁(1959).列宁全集(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Lenin(1959). Complete Works of Leni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5]列宁(1983).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Lenin(1983). Lenin's Views on Press and News Writing(1st edition).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16]列宁(1986).列宁全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Lenin(1986). Complete Works of Lenin (2nd edit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7]刘克明(2003).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3),6.[Liu Ke-Ming(2003). The Bureaucratic Elit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3),6.]

[18]刘克明,金挥(1990).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第1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iu Ke-Ming, Jin Hui(1990). The Sovi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in 70 Years(1st edi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齐向(1992).苏联解体内幕(第1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Qi Xiang(1992).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st edition).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石妍,金欣(1999).走出克里姆林宫的人(第1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Shi Yan, Jin Xin (1999). Out of Kremlin Palace(1st edition).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Reevaluation of Mass Media in the Glasnost of the Soviet Union

HOU Lij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Glasnost" reform, which was initiated by the last Soviet 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during 1985-1991,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Also the "Glasnost"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 of mass media had their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but Gorbachev's false understanding of reform and the devi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sulted in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original policy. In addition, after Gorbachev's letting go of the pace of the reform, the reform ultimately exceeded his 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created a spillover effect.

Key words: Soviet Union; Glasnost; Mass media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2期。

文章录入: 王健 责任编辑: 王健

- 上一篇文章: 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
- 下一篇文章: 美国报业现状

友情链接

tiffany Jewellery	moncler jackets	moncler branson	新华传媒	传播学论坛	moncler jacket
	总编辑与出版者		中国产业报协会		
	moncler down jacket				虚位以待